

宋金墓葬中的孝行图像研究

王奉彩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孝行图像作为墓葬美术中常见的人物题材, 中原北方地区宋金时期的壁画墓葬中颇为流行。本文以宋金时期的孝行图像为考察对象, 对孝行图像的内容、特点进行梳理, 分析孝行图像在墓室建筑和壁画中的位置以及与周围图像的关系, 从而得出孝行图像在宋金墓葬中出现的原因以及意义。

【关键词】宋金时期; 孝行图像; 丧葬文化

【DOI】10.12294/j.issn.1673-0992.2022.06.055

前言

1998年2月, 河南新密市平陌村村民挖房基时发现一座壁画墓, 墓顶局部破坏。墓中出土买地券书“大观二年三月初拾”字样, 大观二年为公元1108年, 推测此墓当属北宋末年。据发掘报告可知, 该墓为仿木结构砖室墓, 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 墓室平面为八角形, 壁面遍饰彩绘图案和壁画。墓顶结构可分为上下两部分, 墓室内原绘有15幅壁画, 现存13幅较好, 其中墓室壁面7幅(南壁设墓门, 未绘壁画), 顶部6幅(南、西南壁脱落)。

墓室下部壁画损毁较严重, 主要是反映墓主人日常生活场景, 有梳妆图、家居图、备宴图等。顶部壁画共8幅, 西南壁、南壁已脱落, 余6幅尚保存较好。所绘主要是孝行图和反映超度升仙内容的。画面布局似以北壁为中心, 左右对称, 东南壁为赵孝宗行孝图, 画面中央竖书“行孝赵孝宗”; 东壁左侧绘鲍山行孝, 画面左侧竖题“行孝鲍山”, 右侧绘王相(祥)卧冰, 画面右侧题“王相”二字; 西壁内容应为闵子谦行孝, 画面5人, 谦父在左, 面容清瘦, 神情严肃, 左手举一纸休书。右侧谦母梳高髻, 着赭黄色儒, 素裙, 凤头鞋, 左手叉腰, 右手前指鸞父, 怒容满面。闵子谦立于父母中间, 双手揖于胸前, 正在为母求情。谦母身前立一女童, 身后立一男童。此画无榜题, 但从内容看, 表现的应是闵子谦“芦花套衣, 父前留母”的故事。西北壁、东北壁、北壁绘画有“四洲大圣度翁婆”以及超度和升仙等内容。

平陌村宋代壁画墓中的行孝图是宋金时期壁画墓中常见的图像类型, 因其流传范围较广, 流行时间更是跨越了唐、宋、金、元等时期。从而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 国内外有关孝行图的研究不断增多且日益深入,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丧葬环境中的孝子图进行了探讨^[1], 涉及孝子人物考辨^[2]、“二十四孝”图像与文本的比较、图像的功能和意义^[3]等方面。

图像是历史、文化的具象表现, 很多时候我们无

法用单一的视觉方式对图像产生全面的理解, 因此需要我们将视觉资料与历史、社会文化史料相结合, 进行深入挖掘、细致分析。例如图像的构图、位置、工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细节来揣摩创作者的意图及含义。

如果仔细观察平陌村宋墓中的孝行图像的位置与构图, 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从构图来看, 该墓中的壁画分布有序, 建筑构件与彩绘纹饰繁复精美, 每幅孝子图像都在斗拱之上的墓室顶部, 水平方向排列, 以北壁为中心左右对称排列。从内容来看, 从两侧孝子王祥和鲍山的画像出现在东壁上, 孝子闵子谦的画像出现在西壁上, 紧接着是东北壁仙人引渡墓主人夫妇过仙桥, 西北壁上“四洲大圣度翁婆”, 中间北壁上描绘祥云环绕的仙界楼宇。画面似乎暗示着墓主人在死后世界可以选择的不同路径通往仙界。而不论是王祥、鲍山, 还是闵子谦, 在墓主人前往仙界的过程中好似都起到协助死者升仙的作用, 使得墓主人在神明的引领下到达图中的乐土。

这种现象促使我们思考: 孝子图像被安排在墓室中的哪些位置? 有什么特殊含义? 墓内安排孝子图像是否只起到为了帮助墓主人升仙的作用吗? 这是一个特例还是一种普遍的墓葬装饰手法?

一、墓葬中的“二十四孝”图像

关于孝子故事的文字记述和图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孝子图像自东汉年开始便出现在墓室壁画、画像石等丧葬艺术中, 北魏时期, 许多石葬具上刻有孝子故事的图像场景。但是墓葬中成组孝行图的出现大致始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 至金代中期最为流行, 元代继续发展。宋金墓葬中的孝子图资料主要发现于河南、山西和陕西等地, 另外, 甘肃、宁夏、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的墓葬或石棺装饰中也出发现孝子故事图的零星案例。就数量来看, 豫西北、豫北、晋东南、晋南是孝子图最集中的地区, 通过大量的墓室壁画我们可以发现孝子图像的刻画方式, 孝子图像的数量、内容等具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宋金时期的墓葬壁画中有孝子故事题材的墓葬很多,在这里仅选择保存较好、孝子图像数量较多并有人物故事题记一些墓葬进行分析。^[4]

与新密市平陌村宋墓相同,河南孟津张盘村发现的北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张君石棺,也采用水平排列的方式,绘制孝子图与升天图。在石棺前挡刻有妇人启门及墓主人升仙等场景,两侧棺帮后部及后挡刻画孝子图像,不同的是张君墓采用阴线刻画24幅孝子图像,并皆附榜题。此外,宋金墓葬中不乏用砖雕形式表现24幅孝子图像的案例,例如河南林县城关宋代雕砖墓、山西稷山马村4号金代雕砖墓、山西沁县西林东庄村金代雕砖墓、山西壶关下好牢宋墓(1123年)等。

二、宋金孝子图像的形式特征

通过对以上各墓中的孝行图像分析可以看出,宋金时期孝行图像具有小幅、成套、多组的特征(图1),孝子图画幅较小,且每组图像之间有分隔,“幅”的形式较为明确。

(一) 内容

各个时期的孝子图像具有不同的叙述特征。汉魏时期的孝子图或表现为连环画式的图绘,展示连续的叙事情节,或通过强调一个或多个主角、故事背景、重要道具等来象征特定故事。宋金时期通过描绘一个重要场景来概述整个故事。画面通常选择主人公孝行事迹中的单一环节进行单景式构图,凸显出故事中最有代表性的情节。例如荥阳孤柏嘴宋代壁画墓中的王祥行孝,将长长的文字记载通过“卧冰”这一个重要场景简洁的表现。画面内容通常只描绘1到3个主要人物,根据人物姿态、场景及榜题反映出故事内容与人物身份。以董永行孝为例,荥阳司村宋代壁画墓、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荥阳孤柏嘴宋代壁画墓的彩绘壁画以及山西壶关下好牢宋墓(图2)中的砖雕壁画,都采用相同的表现形式,画面只有简单的两个人物,董永站在地面望向乘着祥云的织女,旁边题记“董永行孝”。

这种构图上的选择能够保证观者在第一时间识别图像内容,又可以在有限的绘画面积内尽可能展现整套的孝行图像。但这种简明的构图消解了孝子故事的完整情节,强调了多组孝子砖雕的总体视觉效果。所以,从整体来看,孝子砖雕中的主人公似乎成为了一个个孝子形象的符号,虽然他们拥有明确的身份,但图像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使他们更接近于孝行的“集合”,淡化了原有人物的时间、场所。

(二) 位置

图像形式是内容的载体,会影响到观者对于内容的理解,而图像所处的位置又暗示着其内涵和意义。就宋金墓例来看,孝子故事场景出现的位置相对固定:在石棺上多表现在棺帮的左右两侧及后挡部分;在墓中通常出现在斗拱间的拱眼壁上,例如河南登封高村宋代壁画

墓;或被安排在阑额下方,例如,山西长子小关村金墓;有时还会被绘制在天顶下部,例如河南荥阳司村宋代壁画墓,河南登封高村宋代壁画墓(图3)。孝子图不作为墓室壁画或砖雕的主体部分,多位于一些相对次要的位置。孝子砖雕的尺寸较小,暗示着孝子图在墓中并非作为主要图像内容出现。若不是仔细观看,这些多组的小幅图像就只能作为墓壁上方的装饰性图案。

当然也有例外,如山西壶关下好牢宋墓(1123年),门窗和耳室中的山水图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但作为辅助纹饰的孝子图像比例相对较大,同时也被安排在了略为显眼的位置。但从墓室整体空间来看,除人物图像略小于武士外,孝子图几乎构成了墓室内人物图像的主体。这样的布局排列,使得孝子图于此墓中更加引人注目。孝子图营造的孝道氛围也更为凸显。长治沁县故县镇中学二号墓(图4)也是同类情况,模块化的孝子图占据了主要壁面。

综合来看,孝子图像虽处于辅助、次要位置,但其在墓葬中装饰的位置比较多元,在一些墓葬总孝子图像所占据的位置也更为显眼,这可能表示孝子图像在这一地区受到更多重视。孝子图像在宋金时期墓葬中频繁出现,这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考察宋金墓葬中的孝子题材,分析图像的形式与内涵,探讨孝行图像流行的历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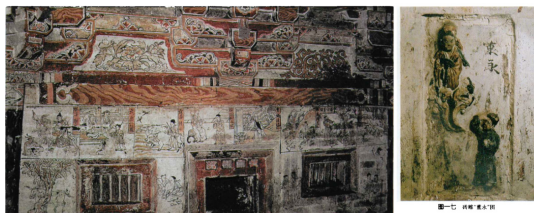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三、孝行故事流行的原因

(一) 政治上的推崇

政治上对孝行、孝道的推崇是孝行图像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北宋初年,在经历了五代十国之乱后,统治者企图将儒家思想重新纳入到封建统治之中,延续汉代以来的“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宋太宗两次以行草书写《孝经》,并通过刻碑来推广《孝经》^[5],宋代官方不仅在科举考试加入《孝经》,还专设立“孝悌”科目选拔官员。孝德和孝行也成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其次,宋代官方还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惩罚各种不孝行为。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统》

沿袭唐律,将不孝之人列入“十恶”,对各种不孝犯罪,规定有明确的量刑标准^[6]。再次,由于孝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学在宋代取得了绝对正统地位,因此宋代对孝的推崇更是不遗余力。

北宋灭亡后,为了缓和北方人民对金朝的反抗情绪,统治阶级重视儒家思想、崇尚儒学,重视经典,不但在各地广建孔庙,而且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故宋金统治阶级的提倡是这种现象出现的社会基础,北宋和金统治阶级对“孝”的提倡都对本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刘耀辉认为,金代晋南地区流行孝行图体现了该地区人群为强调民族性而全面吸收北宋河南地区文化的遗民心态^[7]。

(二) 孝行图的多重寓意

孝子图在当时成为常见的墓葬装饰题材,不仅仅是因为孝治的推动和宣传,更重要的是由于孝子图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内涵。

墓室中广泛置“孝子图”至少有这样几层含义,首先,墓主人是孝子,墓主人去世后与墓室中的“孝子图”同在,“死者似乎也成为不同时代贤人中的一员”^[8],使墓主人在强烈的道德比附得到极大的满足。其次,墓主人的子女及家庭成员为孝子,在墓室中广置行孝题材图像,建造相对“豪华”的墓室,使“孝”有了物质载体,子女及家庭成员也因为完成了被社会共同规定的“孝”而得到内心的满足,并得到社会的肯定,这也使得墓葬在社会现实层面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意义。再次,国家以“孝”为治国之本,世人皆为孝子,“孝”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规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强调封建人伦关系的等级观念,包括对封建家庭的孝以及由此转变出来的对皇权的忠顺,即孝治国安民作为宋统治阶级的立国原则。

(三) 升仙思想的影响

在河南、山西宋金墓内的孝行人物中,绝大多数孝子的事迹都带有孝报的色彩,例如,有关舜的画面都被表现为孝感天地、鸟耕象耘的情节,描绘舜持鞭赶象耕种、上有飞鸟的场景,具有非常固定的图式。宋金墓葬中的“郭巨埋儿”题材,常着重刻画郭巨掘金的情节。这些情节的主题不是主人公的孝行,而是孝感神明所获得的嘉奖,通过突出孝子由于行孝而获得来自上天的协助或奖赏,来宣扬行孝必得好报的观念。

如《艺文类聚》卷二十引梁元帝《孝德传序》明确说道:“夫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邻火不焚,地出黄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称”^[9],文中提到了最具孝感、孝报特征的孝子故事,强调孝行的特殊功能。宋金时期孝子图像中像并不重视叙事情节的完整,而是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场景来强调孝子感通神明^[10]的特殊内涵。

虽然孝道被人们视为儒家传统,但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渗透到道教观念的许多方面。在道教的观念中,行孝得福得神佑,而不孝则会遭鬼神不容。更重要的是,孝行还通常被认为是死后升仙的重要条件。行孝可以列入仙品,早得桂苑仙界之福而不朽。比如《文昌孝经》中写到:“人果孝亲,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到仙班,万事如意,子孙荣昌,世系绵延。”^[11]

毕竟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人成仙有两种途径,要么自己修炼成仙,要么通过到达仙境成仙,前者绝非易事,后者成为大多数人的期望,墓葬装饰中“孝行图”与墓室中的祥瑞等所象征的仙界相呼应,为墓主人死后成仙的期冀提供了多种可能性。^[12]

四、结语

河南、山西等是孝型图像流行的重要区域,作为该区域宋金墓葬中普遍存在的墓葬装饰题材,孝行图像的出现是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孝亲观与升仙思想之间的联系很可能是孝行图像在墓葬中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与复杂难懂的文字相比,成套的图像样式在面向广大普通民众时,可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发达的刻书业,可能推动了晋南地区孝子图的盛行^[13]。

上述观点可能只是孝子图像多层涵义和功能中的一个方面。正如其他学者提出的,在不同的丧葬环境中,它们可能还具有其他特殊意义:彰显墓主人以及子孙孝行,或是作为生者与死者间的连接,进而代替生者在墓中侍奉墓主等^[14]。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和单一的考虑图像的功能,需要与墓葬结构、随葬品、出土文献甚至是其他图像材料结合起来讨论。同时,在分析过程中,我们还要强调图像是整个墓葬乃至习俗的一部分,对图像题材的解读无法脱离对当时丧葬观念的理解^[15]。

参考文献:

- [1]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 [2] 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87页。
- [3] 欧阳询,等,编撰.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 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唐研究》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5] 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王奉彩(1996,01-),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